“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李德鹏[1] 吴志成[2]
（1. 外交学院 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91）

内容摘要：冷战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上升，“全球南方”开始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全球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全球南方”国家通过转变治理理念、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增强治理动力和优化治理方式等途径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南方”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践中也面临国家发展水平与治理能力分化、地缘政治动荡、内部竞争加剧以及西方霸权主义压制等诸多挑战。“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倡议者、推动者、贡献者，通过提高治理能力、加强伙伴关系建设、贡献有效公共产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打造“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关 键 词：“全球南方”；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DOI：10.13885/j.issn.1000-2804.2025.05.003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25）05-0043-13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热点议题。“全球南方”的崛起无疑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演进的重要变量，必将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重要影响。目前，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对现存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此，深刻把握“全球南方”的内涵和发展历程，阐析“全球南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及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举措，对于“全球南方”加强团结合作、践行全球治理倡议、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利益诉求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南方”作为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一）“全球南方”的兴起

“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息息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蓬勃展开，亚洲和北非先后有20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在全球政治舞台的出现和兴起。1961年9月，25个发展中国家首次举行不结盟国

收稿日期：2024-04-30
作者简介：李德鹏（1993-），男，河北保定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外交与全球治理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家首脑会议并通过《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1964年6月，以《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通过为标志，七十七国集团正式成立，第三世界国家阵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66年1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在古巴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洲会议，这次会议拓展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内涵，将其从亚洲非洲范围延伸至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强化了“第三世界”的统一身份属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南方”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推动南北对话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球南方”坚持的国际议程和南南合作进程遇到阻碍。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兴起及华盛顿共识的推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发展议程受到冷落，南南合作势头也呈现颓势，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作用下降[1]。1980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描述南北发展差距和不平衡的“勃兰特线”，使得“南方”概念在国际社会广受关注[2]。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发展，拉开了“全球南方”经济崛起的序幕。根据有关统计，1992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7.7%，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占42.3%。到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已经占到全球50.04%，超越发达国家GDP总量[3]。预计到202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将达到61.49%，发达国家占比将不到四成[4]。在这一阶段，国际政治的分化组合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加速“全球”与“南方”的结合，“全球南方”概念逐渐替代“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等具有意识形态和等级化隐喻的术语[5]。

2009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已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接替七国集团（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主角。2023年8月，第十五届金砖国家峰会召开，一致同意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加入金砖大家庭，金砖国家组织迎来历史性扩员。2023年9月，二十国集团正式邀请非洲联盟成为正式成员，是“全球南方”崛起的又一力证。

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全球经济影响力，“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立场越来越受到重视。2022年2月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后，多数南方国家坚持“不站队”的中立立场。2023年3月，超过50个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表态不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82个南方国家拒绝支持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会员资格，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南方国家甚至大幅增加与俄罗斯的贸易额，与美国和西方通过经济制裁消耗俄罗斯的行为背向而行[6]。“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自主性是政治上普遍觉醒的重要体现，促使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南方国家的意见，并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

“全球南方”是“南方”概念被赋予更多世界政治意涵的拓展与延伸，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也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7]。“全球南方”不是一个静态概念，其定义和范围受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因素影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在发展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大多处于农业社会或尚未实现现代化；在政治层面，“全球南方”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追求改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因为具有明确的发展诉求和国际地位诉求，“全球南方”成为与“西方”和“全球北方”相对的重要概念[8]。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全球南方”名单由联合国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制定，中国和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位列其中[9]。

（二）“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尽管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导创设并运行，但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全球南方”声势壮大，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从体量上看，“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大多数都是全球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国。这些国家承载了全球大部分人口，在全球议题中的利益关切和诉求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不容忽视。从能力上看，“全球南方”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全球南方”中的新兴大国在全球议题上展现出很强的决策力和领导力，成为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性和发言权的核心力量。在领域上，“全球南方”在气候变化、维和行动、公共卫生、全球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中积极承担责任和义务，展示出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和建设性作用。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西方大国主导的产物，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缺乏足够考虑，其代表性受到质疑。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崛起以及全球性挑战突出的情况下，现有国际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应对能力不足。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既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愿望。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案的贡献者。“全球南方”积极提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体方案，在气候变化、减贫、文明交流和人工智能发展等方面推动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创新与改进，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包容和有效。这些国家主张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安理会纳入更多代表“全球南方”的声音。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具有“全球南方”特色的理念和方案。

（三）“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利益诉求

“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

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代表性。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国家在议程设定和投票决策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势，常常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过去数十年，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10]。然而，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却未获得与其经济发展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6年调整配额和投票权，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增加了6个百分点，但不发达国家仅有3.5%的投票权，与在联合国拥有23.8%的投票权目标相去甚远[11]。因此，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是其核心诉求之一。

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公平性。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权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旧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处于话语权缺失的被动态势[12]。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议题只有在获得超过85%的赞成票时才能通过，而美国的投票权为16.5%，依然持有“一票否决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有6个G7成员国，其投票权之和超过50%，其余180个国家的投票权之和不足半数[13]。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投票排名前十的国家中，G7成员国均位列其中，投票权之和占50%以上[14]。“全球南方”国家既面临歧视性和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在当前规则框架下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因此，“全球南方”要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西方主导的治理模式更加体现合法性和透明度，充分反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和责任。

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现有国际机制复杂化、碎片化特征凸显，在应对改革与新兴挑战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方面，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加剧全球信任赤字，恶化全球治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现实政治环境[15]。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性风险，西方国家逐渐转向“内倾自顾”，进一步削弱全球治理效力。另一方面，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决策程序繁琐和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突出。例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涉及许多国家的利益，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任何改革方案的通过均需要这些国家一致同意，从而需要漫长复杂的改革和生效过程。2005年联合国改革峰会提出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建议，但至今未能达成共识。2010年G20峰会达成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方案，但是这一改革方案直到2015年12月才被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面对国际机制有效性不足问题，“全球南方”国家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机制的专业性和运行效率，增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成效

面对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成员，呼吁转变治理理念，扩大治理主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推动全球治理理念更为公平

面对全球治理实践的复杂变化，“全球南方”努力促进全球治理理念更新。

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遵循。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曾饱受霸权干涉和殖民掠夺的迫害，对维持国际和平环境与发展国际友好关系有着由衷的渴望和追求。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原则写入联合声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及和平解决争端，得到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随后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指导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申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也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机结合到国际关系七项基本准则之中。直到当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久弥新，依然是指导世界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价值基础和指导原则。

积极倡导公平的发展权利。“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常常被动地接受西方大国的支配甚至恶性竞争。为提高话语权，增加贸易机会，“全球南方”将发展权概念运用到争取经济发展公平权利的运动之中，努力争取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平等权利。经过“全球南方”国家的不懈推动，联合国于1981年设立一个负责研究发展权的专家工作组，并在1986年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发展权”作为一项各国人民共享发展红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得以正式确认。

促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工业化进程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追求经济绝对增长过程中破坏生态系统，导致自然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加剧。为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全球南方”采取了多方面行动。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印度等国家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目标”理念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议程[16]，最终推动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绿色丝绸之路”倡议，旨在推动共建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承认和重视。

推动确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护环境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但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对某一具体环境问题的贡献和解决能力有所不同，不同国家对气候治理承担的责任应有所差别。1992年，“全球南方”推动该项原则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1997年，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推动下，旨在抑制全球变暖、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最终通过。2015年，在巴黎气候协定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减排责任，为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巴黎协定》最终得到全部175个缔约国一致通过，全球气候治理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17]。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全球南方”推动成立“损失和损害”专门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抵抗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是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突破，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性胜利[18]。

（二）促进全球治理主体更为多元

主体多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特征，“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进了全球治理行为体的多元化。

推动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同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由大国霸权治理向各国共同治理转变，“全球南方”国家展现出积极的参与意愿和负责任的态度。以“全球南方”国家加入二十国集团为例，2008年前，七国集团一直占据全球经济事务决策的主导地位。金融危机爆发后，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凸显，G7对世界经济事务决策权的垄断被打破。2009年9月，匹兹堡领导人峰会通过声明，确认G20是全球经济事务主体，并承诺建立涵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以此作为全球经济事务的决策机构[19]。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事务主导权从G7转移到G20，彰显了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体更为多元与平衡。

发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政府间国际组织弥补了主权国家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短板，能够履行单个主权国家无法实现的职能，是全球治理实践的重要主体。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多边事务，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既有国际组织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还发起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组织。10多年来，共计1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突破传统地理界限，涵盖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的“全球南方”国家，还成为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合作平台。

支持非政府国际组织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具有灵活性和中立性，能够有效协调多方利益相关者，拥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充分肯定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治理地位，旨在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合法性和代表性。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推动下，非政府国际组织在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协同治理。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治，通过发挥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等行为体的治理优势实现有效治理。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南海沿岸国家积极发挥主权国家的影响力，并联合东盟、亚投行、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在内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共同打造良好、和谐的南海海洋治理网络[20]。

（三）促进全球治理动力更为持久

“全球南方”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动者，试图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南方”的区域合作方案，增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意愿与发展活力。

推动区域与次区域一体化发展。“全球南方”通过一体化合作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实现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目前，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和拉美地区的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等组织活跃在地区甚至全球舞台，成为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的重要力量。这些区域及次区域合作与协调机制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提升，也为成员国提供了事务磋商和政策协调的机会和平台，使成员国能够在更加平等和互利的框架下达成共识、协同发声，从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1+1>2”的集体效应。

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探索多层次、多领域的“区域+”开放型合作机制，加强“全球南方”跨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旨在通过洲际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策协调、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各国合作与共同发展。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与中国、日本、韩国创建“东盟+3”（亦称为“10+3”），后将之拓展为东亚峰会机制，以打造“亚太跨区域合作网络”。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进程，最终打造一个“区域+”治理的东盟模式[21]。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非盟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等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全球南方”经济稳定合作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借助“三方合作”丰富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二战后国际发展援助模式主要为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呈现“南升北降”趋势后逐渐面临“援助疲软”、南南合作非体系化、南北国家主导原则之争等问题[22]。“三方合作”是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促进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之间的相互学习、加强政策对接协调，“三方合作”能够促进南南、南北之间的援助行动达到最佳效果，弥补传统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不足[23]。进入21世纪，“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逐渐从受援国转变为新兴援助国，三方合作发展模式兴盛起来。在三方合作项目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中，巴西、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支持者，不仅在项目数量上位居前列，在资金投入、政策设计和经验分享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4]。

（四）推动全球治理机制进一步优化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南方”通过合作与创新推动全球治理机制优化与完善，力图打破不平等局面，提高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权和投票权的不足，“全球南方”努力推进改革相关机制，增加南方国家权重。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2010年改革方案，即发达国家份额由60.05%减到57.7%，发展中国家从39.5%增加到42.3%[25]。各成员国投票权也得到相应提升，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投票权显著提升，均位于前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构成方面，IMF执行董事会同意对SDR货币篮子进行扩容，将人民币纳入其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贡献增多，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于2022年得到提升，货币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26]。

推动世界银行改革。2008年，世界银行开始改革发言权和参与权。一是世界银行确定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基本投票权增加一倍，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从42.6%上升至44.1%。二是在国际开发协会中，世界银行规定其发达国家成员国向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提供金融援助，将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国际开发协会中的投票权提高约1.6%。三是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董事会席位，提升这一地区在世界银行的重要性。2010年，世界银行股权结构改革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转移3.13%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由44.06%增加到47.19%。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从第六位跃升为第三大股东国[27]。在2018年新一轮调整中，世界银行确定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共计增资130亿美元，并将中国投票权提高至5.7%[28]。

促进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设立与发展。“全球南方”国家推动联合国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特别部门等组织，为南方国家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正是在联合国相关机制下，“全球南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推动联合国确立“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确保发展中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拥有永久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并自由行使以上权力。1974年，“全球南方”推动联合国通过《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权威支持。非盟重视维护本地区安全秩序，着力推动确立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伙伴关系。2006年，联合国与非盟建立和平与安全协调机制，组建非盟办事处和联合工作组，以便更好地磋商与评估非洲的安全问题[29]。

三、“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

“全球南方”国家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挑战。“全球南方”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差距加大了内部离心倾向，新兴大国竞争和西方霸权主义施压增加了“全球南方”的合作难度。

（一）发展赤字日益加重

总体上，“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赤字问题比较突出。

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当前，“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面临一系列挑战，严重限制南方国家的集体行动能力。一是一些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符合自身国情。20世纪90年代，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模仿西方国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些国家发展模式的缺陷，令其陷入债务危机或中等收入陷阱，削弱了这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力基础。二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现阶段发展中国家正在普遍经历从制造业向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这不仅阻碍其资本积累，还抑制了那些存在“过早去工业化”趋势国家的经济追赶[30]。大部分南方国家只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游，这反过来又限制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市场活力和开放程度不高。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存在垄断和封闭问题，不仅限制了资源技术流动和新兴企业进入，导致其丧失市场活力和竞争能力，还使“全球南方”长期处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边缘位置，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自然灾害、地缘冲突等外部因素冲击。一是全球疫情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解。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贫困人口增多。根据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较上年增加1.19亿~1.24亿人，极端贫困率较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是22年来的首次上升[31]。如果减贫工作持续受到挑战，到2030年仍将有5.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贫困率约为6.8%[32]。二是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据统计，遭遇自然灾害的南方国家平均每年因灾害损失的GDP达到1%。亚太地区承担的成本最高，平均每年因灾害损失的GDP达到1.6%，而在发展中国家，最贫困者受灾最为严重[33]。三是地缘冲突与战争增加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担。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造成国家分裂和发展停滞，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日渐增加。

（二）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凸显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能力不足问题严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艰巨。

社会政治局势不稳定。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模式，难以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作用，导致经济发展困境，社会动荡不稳。这些国家不仅没有获得独立发展机会，反而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攫取战略资源、转移结构性危机的价值洼地。中东地区的战争和冲突乱象不止、亚非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状，即是印证。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大部分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但这种西方式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适应非洲实际，导致一些国家遭遇民主崩溃。

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盛行。“全球南方”国家官僚体系普遍面临提升公信力和治理有效性的挑战。官僚主义不仅体现在决策过程冗长，还体现在权力高度集中和问责机制缺失，导致基层部门执行不力或流于形式。例如，某些拉美国家的教育或卫生改革政策，尽管在联邦/中央政府层面制定了良好的政策框架，但由于基层官员缺乏动力和责任感，执行过程敷衍了事，无法真正改善公共服务。腐败问题是“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的突出难题。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由于制度设计不完善，司法系统和执法部门容易受到腐败影响，法律无法得到公正执行。一些非洲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肯尼亚、马拉维、南非等国的反腐败机构在打击腐败方面享有一定自主权，也导致这些国家的反腐败行为缺乏公正性和有效性[34]。

极端势力、跨国犯罪活动猖獗。叙利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暴力冲突长期存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持续激化，不仅破坏相关国家的法治和安全，消耗大量政府资源，还削弱了自身治理能力。此外，极端势力往往从事非法毒品交易，导致国家安全体系和执法机构陷入恐怖打击和毒品治理复杂难题中，难以将更多精力聚焦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毒品贩运集团不仅操控大部分毒品市场，还向极端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在阿富汗、尼日利亚等国，极端组织通过毒品贩运获得经济支撑，并在社会动荡背景下不断壮大。

（三）外交策略选择上的差异性

随着“全球南方”内部实力的分化，不同南方国家对自身和他者的认知出现差异，在具体对外策略选择上逐渐分道而行。

新兴大国对“全球南方”领导权的兴趣增强。印度自诩为“全球南方”领导者，利用作为2022年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度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机会，争取更多南方国家支持其以联合国改革为核心的“改革多边主义”。2023年，印度举办两届“全球南方”集中峰会，以“扩大‘全球南方’的声音”为主题拉拢南方国家[35]。印度还提出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性方案，并在金砖国家机制中对中国实施软制衡。俄罗斯不断巩固其在独联体国家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领导优势和影响力，通过深化与非洲、拉美、亚洲等“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试图突破美欧经济制裁，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中小国家倾向于采取平衡外交策略。面对大国博弈加剧，许多中小国家或采取中立立场，或实行灵活的平衡外交，以谋求自身行动空间和回旋余地。东盟坚持“中立”承诺，有选择性地与中美两国开展务实合作，致力于在中美竞争的战略环境中充当诚实的斡旋人。越南在保持对美和对华基本平衡的同时，积极引入第三方力量以平衡中美两国影响力。拉美国家也采取“积极的不结盟外交”，对美国和中国保持不偏不倚的外交策略[36]。这种平衡外交策略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与大国发生冲突，但客观上加大了“全球南方”团结的难度。由于“全球南方”内部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也缺乏协调利益差异的统一行动纲领，如果成员国的多样化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协调，“全球南方”将陷入内耗困境，制约其整体作用的发挥[37]。

（四）美西方霸权的蓄意打压

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的打压遏制严重影响“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效果。

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掌握议程设定和决策主导权的西方国家并不愿意新兴国家跻身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圈层，并为此采取多重限制措施。一是运用单边经济制裁封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如2016年以来，美国利用出口管制清单制度制裁中国企业近500家[38]。二是采取逆全球化行为以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这种“退群”行为加深了南北关系裂痕，增加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无益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全球治理责任赤字进一步突出。三是利用人道主义干涉内政。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反恐和人道主义干涉为由，直接介入巴拿马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21世纪又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战争代理化”方式推动实现其霸权策略与利益目标。这些行为破坏国际合作生态，导致“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外部干涉与内部动荡双重压力[39]。

突出意识形态划线。西方国家认为自身的地位和权威受到“全球南方”的全方位挑战，试图利用意识形态工具破坏“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一方面，持续向“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美西方国家通过策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和中东多国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冬”，扰乱相关国家政治秩序，力图达到拉拢、弱化、分化“全球南方”国家的目的[40]。另一方面，蓄意挑起“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西方国家利用“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威胁论”等，设置意识形态陷阱，人为制造“文明冲突”，输出其民主价值观，制造对抗性价值观阵营。最近几年，西方国家持续炒作“全球南方”概念，宣扬中国不是“全球南方”国家，意图离间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削弱“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力量[41]。

蓄意挑起阵营对抗。西方国家热衷于拉帮结派，分解和制衡“全球南方”新兴大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美国延续冷战思维，将“竞赢”中国作为未来十年的总目标，通过“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打造排华小圈子，利用“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等手段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美国近年推出“重建美好世界”计划，试图联合七国集团成员，拉拢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抗中国[42]。欧盟于2021年推出“全球门户”战略，日本制定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扩大计划，并与印度联合制定亚非发展走廊计划，旨在争夺全球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四、“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重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因应时代需求，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明确着力重点，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

（一）推动发展治理，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合理发展，必须建立在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基础之上。

增强经济发展实力。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为实现共同发展，“全球南方”通过区域和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深化发展合作，进一步完善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等南南合作平台，特别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了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实现高水平互利合作。发挥“全球南方”中的新兴援助国的影响力，聚焦发展中国家需求，提供全球发展治理方案，为南北合作提供有益补充。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履行援助承诺，确保援助资金有效用于可持续发展项目，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共创全球经济繁荣。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根基，只有实现好国家治理，才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根据国情推动政府治理机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科学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加强国家治理经验交流。“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相似的发展挑战，肩负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发展速度较快，拥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发展理念，为其他南方国家发展树立了榜样。通过举办交流活动进行政策沟通和磋商，共享改革和发展经验，南方国家能够共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全球发展合力。

优化全球发展机制。深度参与现有国际组织合作和国际条约谈判与制定，加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深化金砖合作机制、“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同欧盟相关机制合作，实现机制功能最大化和优势互补。促进现有多边机制改革，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制改革，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意愿。创设新机构新平台，或创新制度运行模式，通过创设类似“金砖+”“上海合作组织+”、双边和多边合作论坛等方式，开创国家间交往合作的新模式，弥补现有制度的不足，更好适应当今时代发展与合作需求。

（二）加强伙伴关系建设，塑造集体身份认同

面对全球性风险叠加和西方霸权压制，“全球南方”国家应强化集体身份认同，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之路，需要“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当前，个别国家对“全球南方”领导权的竞争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容易被西方国家利用与挑拨，不利于“全球南方”的团结与协作。南方国家应坚持合作共赢，努力建立普遍信任、深度信任和长期信任关系，利用各种国际机制平台加强交流，团结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利益相近国家，利用双边多边渠道或区域跨区域机制，共同增扩普遍性话语权，提升制度性话语力[43]。结伴而不结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选择，也是维护主权完整、加强战略自主的共同政治底色。南方国家秉持战略互信、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将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持续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加强集体身份叙事。不论是“全球南方”中的新兴大国，还是中等强国、最不发达国家等群体，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中都面临复杂的全球性挑战。而形成“全球南方”集体身份，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治理中的主体间性难题，还能推动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全球南方”国家应明确身份定位，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坚定发展中国家立场，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捍卫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集体权益，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为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公正权益。要强调共同价值，认清西方大国鼓吹“普世价值”的战略图谋，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塑造集体身份、共享价值与合法性认同。

（三）担当新兴大国责任，贡献有效公共产品

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南方国家贡献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大大增强，已经成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应发挥引领作用，主动担当大国责任，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有效的公共产品。

积极承担领导责任。新兴大国是最具发展活力的国家，具有为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南方”方案的能力和优势。一是提高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积极性。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将赢得更多国际认可与信任，夯实国际领导的合法性基础。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大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自身发展机遇，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其他新兴大国也要负起相应责任，带领“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走向繁荣和富强。二是不走霸权供给道路。由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模式既增加了全球治理成本，又可能陷入称霸扩张的老路。新兴大国提供公共产品应以相互尊重、共商共建共享为愿景，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为前提，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和共同繁荣。三是尽力与量力兼顾。尽管新兴大国取得了发展成就，但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之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新兴大国要关注相关国家的实际需求，不做过多过高承诺，注重提高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全球治理增量改革。

贡献有效的公共产品。一是培养地区与全球认可度。新兴大国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否被区域国家认可是其能否成为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者的重要前提。新兴大国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实践，提升对区域伙伴的包容性与合作深度，赢得更广泛的信任和支持，推动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和有效落实。二是供给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产品。不同新兴大国都拥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奋斗历程和发展经验，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要立足本国国情，挖掘比较优势，贡献国际发展所需的、协调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新型公共产品[44]。三是重视提供新疆域的公共产品。随着太空、极地、人工智能、数字安全等新兴事务及挑战不断涌现，新兴大国应致力于贡献全球治理新主张、新原则和新政策，修正不公正不合理的既有原则规范，让各国人民共享新兴大国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果。

（四）倡导思维转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既需要实力积累和责任担当，也需要从思维和理念上实现突破，倡导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离不开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一是把握全球治理关键。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响应联合国各项倡议，始终维护联合国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二是秉持自由贸易理念。贸易保护主义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不利于实现贸易的高水平发展和投资的便利化。要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推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反对将经贸问题与政治挂钩，建设开放和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三是坚持协商一致。“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45]463南方国家应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消除意识形态隔阂。全球化将各国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对抗只会加剧分歧、引发对抗和冲突。一是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全球性挑战中独善其身，西方一些国家长期秉持的“中心—边缘”“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维模式，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不仅无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战，反而会加剧全球治理赤字。二是反对搞小圈子、小集团。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发展水平不是竞争性、排他性的存在，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责共担。南方国家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寻求共建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竞争性、对抗性思维不适用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平和发展才是解决国际争端、与各国开展互利合作的人间正道。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威胁，南方国家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顺应时代潮流与人类进步方向。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转变对抗冲突的国际关系思维，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历史的必然。一是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根本上破除强权政治逻辑，实现各国平等协商、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安排与发展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每一种文明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都值得肯定。二是推进公平正义。当前国际关系尚未实现发展平等与公平正义，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捍卫南方国家正当权益。三是寻求合作共赢。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各国在国际合作中兼顾别国利益，实现互相成就与互利共赢。南方国家应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以实际行动诠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不断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五、结语

当今世界面临深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人类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同时，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深受不公平不合理旧秩序束缚，导致地区冲突、贫困和饥饿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霸权国家仍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霸权地位，加剧全球治理的不公正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南方”崛起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新的蓬勃力量，正逐渐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促进全球治理变革和实现多极化的重要动力。面对历史赋予的责任，“全球南方”国家应不断增强自身治理能力，夯实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基础，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相互尊重与理解，培育集体身份认同，加强内部团结合作；超越狭隘的竞争思维，以包容和共赢理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提供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助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全球南方”将一如既往贡献智慧和力量，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Gray K, Gills B K.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6, 37(4): 561-576.

[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0.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 (2023-04-11)[2025-01-07].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2025-09-07].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MAE.

[5] 李聆群.“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为例.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6）：68-89.

[6] Gamio L, Swanson A. How Russia Pays for War. The New York Times, 2022-10-30.

[7]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2023（23）：13-20.

[8] 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教学与研究，2024（1）：104-113.

[9] UNDP. Forging a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New York: UNDP, 2004: 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10]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08-23（2）.

[11] 陈曦.全球金融架构改革前景展望.中国金融，2024（7）：77-78.

[12] 于海洋，何康.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新型南南合作的发展路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1）：166-174.

[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Voting Power. [2025-09-07]. https://www.imf.org/en/About/executive-board/eds-voting-power#2.

[14]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ubscriptions and Voting Power of Member Countries. [2025-09-07]. https://finances. worldbank. org/Shareholder-Equity/IBRD-Subscriptions-and-Voting-Power-of-Member-Coun/rcx4-r7xj/about_data.

[15] 吴志成，徐信高.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4）：3-28.

[16] Fukuda-Parr S, Muchhala B. The Southern Origi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deas, Actors, Aspir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2020: 5-15.

[17] Held D, Roger C. Three Model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From Kyoto to Paris and Beyond. Global Policy, 2018, 9(3): 2-12.

[18] 黄惠康.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纪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放签署30周年.国际法学刊，2022（4）：1-33.

[19] G20 Leaders’ Statement: The Pittsburgh Summit, Pittsburgh. (2009-09-25)[2025-02-07]. http://www.g20.utoronto.ca/2009/2009communique0925.html.

[20] 侯丽维，张丽娜.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南洋问题研究，2019（3）：61-72.

[21] 张义明.区域间治理及其“东盟模式”的未来——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评析.东南亚研究，2015（6）：97-107.

[22] 杨理伟.理念、机制、能力：联合国三方合作与中国的参与.社会主义研究，2022（3）：164-172.

[23] 隋广军，郁清漪.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4）：2-25.

[24] OECD, IsDB.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2023-10-01)[2025-09-07].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3/10/global-perspectives-on-triangular-co-operation_4ac56870/29e2cbc0-en.pdf.

[25] 龙安志.人民币国际化：重构全球经济新秩序.张梦溪，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20：111.

[26] 张礼卿.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历程与路径探析.人民论坛，2024（1）：24-32.

[27] 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论坛，2011（2）：8-14.

[28] 世行增资130亿美元 中国投票权上升.(2018-04-23)[2025-09-07].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23/c_129856479.htm.

[29] 罗建波，孙欣.“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洲集体安全的本土知识探索.西亚非洲，2023（5）：103-133.

[30] 刘来会，王磊，安素霞，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追赶.财经研究，2023（8）：94-108.

[31] 联合国统计司.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1-08-18)[2025-01-07].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1/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1_Chinese.pdf.

[32] 联合国统计司.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3-07-10)[2025-01-07].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3/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3_Chinese.pdf.

[33] 2030年全球每天将面临1.5起灾害 人类正被拖入“自我毁灭的漩涡”.(2022-04-26)[2025-09-07].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04/1102312.

[34] Momoh Z.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in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for Sub-Sahara African Transformation & Development, 2015, 3(6): 1-10.

[35] Pathak S. China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Hindustan Times.（2023-02-09）[2025-09-07].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ht-insight/international-affairs/china-and-the-revision-of-the-existing-world-order-101675932676957.html.

[36] Fortín C, Heine J, Ominami C. El No Alineamiento Activo y América Latina: Una Doctrina para el Nuevo Siglo. Santiago de Chile: Editorial Catalonia, 2021.

[37] 李嘉伟.“全球南方”概念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分析.国际论坛，2024（3）：119-13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38]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ntity List. [2025-09-07].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policy-guidance/lists-of-parties-of-concern/entity-list.
[39] 杨宝荣.从“全球南方”看当前国际关系发展新特点.人民论坛，2023（23）：60-69.
[40] 钮维敢，谈东晨.冷战遗留视角下的“颜色革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4）：4-29.
[41] 张杰.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24（1）：91-109.
[42] 王金波.“一带一路”能否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2）：4-31.
[43] 吴志成.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21（5）：25-30.
[44] Anderson R J, et al. Scaling Leadership: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to Create Outcomes that Matter Most. Hoboken, NJ: Wiley, 2019: 5-10.
[4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LI De-peng[1] *WU Zhi-cheng*[2]
（1.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Center,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nations, represented by China, have collectively risen, increasing their influence and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lobal South”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ge. In response to the unjust and unreasonable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have effectively driven its transformation by shifting governance concepts, promoting diverse governance actors, enhancing governance dynamics, and optimizing governance approach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Global South”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disparities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governance capacities,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intensified internal competition, and suppression by Western hegemonism. As key advocates, drivers, and contributors to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Global South” countries strive to improv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strengthen partnerships, provide effective public goods, and establish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y practic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s and collectively build a “Global South”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the Global South;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a century

（责任编辑：寇　甲）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